

从贡赋分派到折银改革 ——兼论明代药材市场的形成与影响

郑 洪

(浙江中医药大学 基础医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封建王朝历来有地方向朝廷进贡地产药材的制度。明代前期,药材均以实物形式上贡,府县分派的贡额与人口、田亩等情况有一定的关联。明中后期,为减轻地方负担,朝廷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各地土贡物品实行折银上交。由于皇家医疗对“道地药材”的需求,在太医院的干预下,药材土贡依然维持实物纳贡,但许多地方仍在县级层面实施折银改革举措,而由府及布政司采购实物解运上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层负担。药材贡赋的分派与改革实施情况,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区域性药材市场正在逐渐形成,是清前期全国性药材市场发展成熟的前奏。

【关键词】药材;赋税;市场化;一条鞭法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5-0073-11

From Tribute Distribution to Silver Currency Reform: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al Materials Market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ZHENG Hong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Abstract: In China's feudal dynasties, the local governments always brought tribut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local medicinal materials by conventio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medicinal materials were all in the form of physical tribut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ribute amount in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was related to population, farmland and so 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local burden, the reform of One Lash Method was carried out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 of Ming Dynasty, and they handed over the equivalent amount of silver currency instead of local specialties like local medicinal materials. Due to the Royal's demand for "geo-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the medical materials were maintained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Royal Medical Hospital. However, many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mplemented the silver discount reform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hief secretary then purchased and transported goods to pay tribute, which had alleviated the burden on the grass-roots level to some extent.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orm of medicinal materials tribute reflected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regional medicinal materials marke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was the prelud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medicinal materials marke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 words: medicinal materials; taxation; marketization; One Lash Method

[收稿日期] 2020-08-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18ZDA175)

[作者简介] 郑洪(1972-),男,中医内科学博士,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药史、中医药文化。

中国传统医学讲究应用“道地药材”，不同药材各有其最佳产地。所以中医有“一张方开全国”的说法。然而药材产地散布天南地北，若想配齐一张方中各种道地药材，在古代殊非易事，除非已形成充分的市场流通。学术界普遍认为，明清时期我国才基本形成城乡市场网络^①，但对其中药材市场的研究不多。傅衣凌先生有关明代商业的研究仅涉及到江西樟树、湖南洪江等个别药材市场^②，其他部分因史料缺乏并未着墨。从一些资料可知，明代城市中药材价格高昂，如元末明初徐一夔记载：“药材多出殊方异壤，其不易致者，一药或价直百金。”^③邱仲麟的研究也指出明代市场上的药材非一般平民所能购买^④。价格虽然是反映药材流通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影响药材市场的因素很多，仅此一项还不足以说明市场网络的情况。

史料缺乏还带来药市研究的一些争议。例如河南禹州著名的百泉药市，号称有600年历史，依据之一是当地卫源庙拜亭东南石柱上石刻文字有“明洪武八年，御祭于四月朔八日，令起大会”^⑤之语，但并无其他史料佐证明代初年即有如此规模盛大的药市。民国时期有学者指出，碑文中的“大会”是指庙会，并非药材交易会，“药商势力之增大，当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以前，因是年已有陕西西安府及河南怀庆府两处药商捐款创建药王庙（见庙中碑文）。……可见目前所谓之药材大会，自昔即非专以药材为交易，但药材之成为大宗交易物品，至少当有200余年之历史”^⑥，也就是到了清前期才发展成大规模的全国性药市。其他史料也表明在清前期京师附近确已形成可以供应各省道地药材的市场，如清乾隆帝曾道经郑州（今河北任丘）药市，作诗并有注说：“凡各处地道药材之至京城及北省市售者，必集于此。”^⑦清前期宫廷应用药材已经停止征贡，改由北京同仁堂药号负责从市场采购，也足以佐证。

清前期基本成熟的药材市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明代必然有一个培育发展阶段，只是缺乏直接和全面的史料来反映。笔者注意到，有一类史料可以提供侧面的观察视角，即明代文献中关于药材贡赋的记载。贡赋是古代封建政府以免费或低价的形式掠夺民间物资的方式，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出“贡赋经济”的概念，指出它还是造就市场的一种因素，是某种经济驱动力，并认为“明清时期的市场，其实是贡赋供应链跟商品流通链结合在一起发展起来的”^⑧。明代中后期实行贡赋折银改革，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进入政府资源运用领域，进一步拉动市场。本文考察发现，明代药材的贡赋分派与折银改革反映了市场发展状况，而且由于产地繁多、专业性强的特点，药材的市场化发展相对于其他物资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一、明代中前期的药材土贡及各层分派

中国素有“任土作贡”（《尚书·禹贡》）之例，“任土作贡”的本意，是各地就土产情况而酌量进献，原本并没有固定数量。明朝开国之后，对包括药材在内的土产均设立定额进贡制度。章潢《图书编》载：“圣祖立国之初，即定诸州所贡之额。如……太医院药材……著为定额，俾其岁办。”^⑨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进而形成了按需派供的额办、坐办、杂办（杂派）“三办”制度。《东谷赘言》说：“我朝军国之需：有额派、有岁

① 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②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1-138页。

③ [明]徐一夔著，徐永恩校注：《始丰稿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④ 邱仲麟：《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5-213页。

⑤ 李集日：《六百年百泉药交会述略》，载《辉县文史资料》（第9辑），辉县政协编印，2006年，第261-269页。

⑥ 刘桐先：《河南百泉的乡村市集》，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中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36页。

⑦ [清]乾隆：《御制诗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7页。

⑧ 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第29页。

⑨ [明]章潢：《图书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1页。

派、有坐派。洪武间，国定制，如夏税、秋粮、鱼课、盐课、茶课、桑丝、药材之类，皆有定则，此额派也。”^①

（一）明代全国药材贡纳情况

与一般土特产只取于个别产地不同，药材的品种多，涉及面广，朝廷对各省有不同的品种和贡额要求，是最为复杂的上贡物料种类。正德和万历《大明会典》列出了各行省缴纳药材的数量（见表1）。

表 1		明代药材解纳数额	
地区	正德时期	嘉靖时期	万历时期
浙江布政司	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一斤七两，金箔一百八贴，银箔七十二贴	三万一千九百九十斤五两，金箔一百八贴，银箔七十二贴	三万一千六百一十斤五两，金箔九百零八贴，银箔七十二贴
江西布政司	七千五百五十六斤一十二两	六千一百四十二斤二两六钱	六千一百四十二斤二两六钱
湖广布政司	四千八百四十九斤七两七钱二分六厘，白花蛇九条，乌蛇十条	五千八百九十四斤二钱，白花蛇九条，乌蛇十条	三千七百三十八斤三两八钱(含朱砂、麝香一百四斤)，白花蛇九条、乌蛇十条
福建布政司	二千七百六十五斤一两九钱一分	二千七百五十九斤七两七钱一分	二千七百六十三斤九两三钱一分(含天竺黄五斤)
四川布政司	一万六千四百二十斤八两，天雄四对	一万七千三百二十一斤八两，天雄四对	一万四千五百一斤一十二两(含麝香、犀角九斤、琥珀二十两)，天雄四对
广东布政司	九千九百二十九斤三两四钱，蛤蚧一十七对	九千二百三十四斤三两四钱，蛤蚧一十七对	五千七百七十一斤一两四钱(含沉香等药二百三十五斤、片脑三十两)，蛤蚧一十七对
广西布政司	九千七百二十三斤一十两	五千八百八十斤	三千八百二十一斤十四两(含山豆根等药二百四十斤、片脑三十两)
山西布政司	八千九百五十五斤四钱五分	八千八百七十斤十两四钱五分	八千八百三十斤十两七钱(含麝香十斤)
山东布政司	八千七百三十八斤六两	八千四百四斤一两九钱 苍术二万二千四百八十斤	八千四百四斤一两九钱 苍术二万二千四百八十斤
河南布政司	八千六百四十九斤四两	八千四百九十二斤十二两	八千四百九十二斤十二两
陕西布政司	一万一千七百四十四斤七两	一万二千九十九斤七两	一万三百一十一斤七两 (含雄黄等药五百三斤)
辽东都司	八百斤	八百斤	八百斤
南直隶	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四斤一两七钱	十万二千八百六十一斤一两二钱(其中苍术六万四千二十一斤)	十万四千九百六十一斤一两二钱(其中苍术六万四千二十一斤)
北直隶	六千五百五十七斤	一万六千八百八十四斤九两(其中苍术八千五百九十四斤)	一万六千八百八十四斤九两(其中苍术八千五百九十四斤)

资料来源：正德时期数字据正德《大明会典》；嘉靖和万历数字据万历《大明会典》卷224《太医院》。其中南、北直隶在原文中所列为各州府数据，本表根据当时区划情况归并，并统计总数。

从表1可见，江南地区（在本文中指南直隶和浙江布政司所属地区）的药材进贡数量是最多的，三个时期分别占到全国的41%、56.7%和60%（仅统计以重量为计量单位的药材）。明清经济史向有“江南重赋”之说，这在药材方面也得到了印证。同时也正是这些地区，在后来的改革中最为活跃。

^① [明]敖英：《东谷赘言》，中华书局，1985年，第24页。

- 75 -

(二)药材贡额的府县分派:以浙江为中心

各省的贡额,需要下达分派到基层行政单位来完成。但正如前述,药材不仅有数量问题,还有品种问题。各个地区如何完成分派?在表1中,江南地区的浙江行省在各个时期都是解纳药材最多的省份,现以该省为中心略作考察。

万历《括苍汇纪》载知府潘润奏章说:“如户部之会计年例、预备供应、修省等事,礼部之牲口、祭祀、药材……部派于司,司派于府,府派于县,县派于里,里派于甲。”^①这种层层分派,是依照什么准则呢?现根据嘉靖《浙江通志》,将浙江各州府贡额一一说明(见表2)。

表2 明中期浙江各府州额办药材情况

府县	品种、数量(南京礼部)	品种、数量(北京礼部,含内府)
杭州	金箔一十二贴,银箔八贴,山梔子七十斤,白术一百斤,密陀僧二斤,续随子六斤	金箔一百八贴,银箔七十二贴,山梔子六百三十斤,白术一千一百斤,紫苑一十斤,续随子一百四斤,草决明五十斤,车前子二十斤,粟壳一百斤,密陀僧二十八斤,萝卜子五十斤,牡丹皮二十斤,白芍药二百斤,香白芷六百斤,吴茱萸二十斤,干木瓜一百斤,干生姜一百斤,千金草五十斤,茯苓三百斤,麦门冬一百五十斤,甜葶苈三十斤 内府:香白芷一百斤
嘉兴府	陈皮一百五十斤,干姜三十斤,木瓜一十斤,车前子三十斤,麦门冬一十五斤	陈皮一千三百五十斤,干姜二百七十斤,木瓜九十斤,车前子二十七斤,麦门冬一百三十五斤,
湖州	僵蚕一十五斤,干葛五十斤,桑白皮二十斤,牛胆南星二斤,乌梅三十斤,蔓荆子三斤,草决明五斤	僵蚕一百三十五斤,乌梅三百七十斤,干葛五百五十斤,桑白皮二百八十斤,牛胆南星一十八斤,蔓荆子二十七斤,草决明四十五斤,枳实三百斤
严州府	茯苓一百四十斤,吴茱萸五斤,菝葜四两八钱	茯苓一千八百六十斤,吴茱萸四十五斤,菝葜二斤一十二两二钱 内府:末香一百五十斤,槐花六百斤,梔子二百斤,乌梅一千四百斤
金华府	半夏八十斤,前胡五十斤,枳实七十斤,青皮五十斤,枳壳一百斤,天门冬五斤	半夏一千一百二十斤,前胡六百五十斤,枳实六百三十斤,青皮四百五十斤,枳壳九百斤,天门冬七十五斤,山梔子五百斤,穿山甲三斤八两,薏苡仁一十斤,半夏曲一十斤,蔓荆子一十斤,猪牙皂角五斤,南星一百斤。
衢州	辛夷五斤,天花粉二十斤,香白芷一百五十斤,熟地黄二十斤	辛夷四十五斤,天花粉一百八十斤,香白芷一千三百五十斤,熟地黄一百八十斤,枳实三百斤,枳壳一千斤,陈皮八百斤 内府:台芎五十斤,槐花六百斤,梔子五百斤,乌梅一千五百斤
处州府	蛇含石四两八钱,甜葶苈三斤	蛇含石二斤一十一两二钱,甜葶苈二十七斤,茯苓二百斤
绍兴府	会稽紫石英四钱,黄药子九斤,牡丹皮四斤,南星三十斤,白芍药八十斤	会稽紫石英三两六钱,黄药子九十斤,牡丹皮三十六斤,南星三百八十斤,半夏四百斤,白术六百斤,白芍药九百二十斤,茯苓五百斤,干木瓜一百斤,吴茱萸三十斤,猪牙皂角五斤,天门冬二十斤
宁波府	香附子二百斤,穿山甲三斤,薏苡仁三斤	香附子二千八百斤,穿山甲三十三斤,薏苡仁二十七斤
台州	台芎五十斤,猪牙皂角一斤,粟壳一十斤,半夏曲一斤,生地黄二十斤	台芎九百五十斤,猪牙皂角九斤,粟壳九十斤,半夏曲九斤,生地黄一百八十斤,白术二百斤,乌药五百三十斤,骨碎补一十斤
温州	乌药五十斤,千金草一十斤,石斛二斤	乌药四百五十斤,千金草九十斤,石斛三十八斤

资料来源:嘉靖《浙江通志》卷17《贡赋志》。

^① 万历《括苍汇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93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585-586页。

再将以上各府贡额数与同书所载该府人口、田地(官田加民田)进行对比(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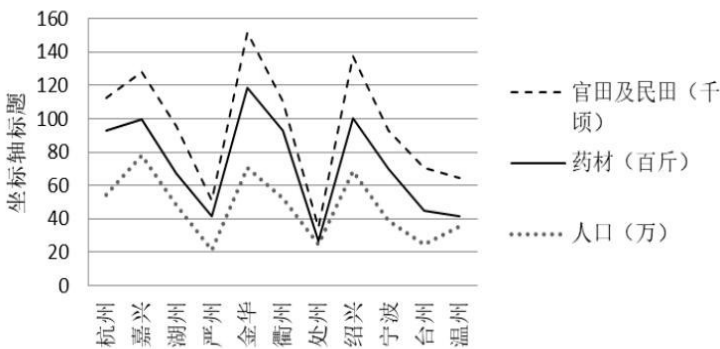


图1 嘉靖《浙江通志》载各府人口、田地与药材贡额比较

从图中可见,三条曲线的曲率非常相似,总体上可以认为,各州府药材的分派贡额与田地、人口数有一定相关性。

再下一个层级,以严州府为例看各县的分派情况(见表3)。

表3	万历时期严州府各县药材贡额情况			
各县	茯苓	吴茱萸	菝葜	松香
严州府	二十斤			
建德县	八十斤	五十斤*	三斤一两*	
淳安县	四百七十斤七两	十二斤四两	十二两六钱四分	
桐庐县	一百一十一斤十二两	七斤十三两	七两四钱八分	
遂安县	三百四十一斤三两	八斤八两	八两一钱九分	
寿昌县	九十斤			
分水县	九十四斤二两	二斤六两		二斤八两

资料来源:万历《严州府志》卷八《食货志》。

说明:表中带*号的两个数据,在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八《食货志》统计于严州府下,建德县无。

无需制图,从表中即可看出贡额数明显集中于淳安、桐庐、遂安三县。虽然三县人口和田地也相对较多,但绝不至于如此悬殊。其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与药材土贡的基本属性有关。明代何孟春指出:“祖宗时于天下之赋着有定额。如丝绢、牲口、药材……等项,亦惟视其郡邑所产而分派之。地各有常数,岁各有常入,远近翕然,称便如一。”^①

理论上,土贡应该“视其郡邑所产”,不产药材的地方就不必纳贡。但贡赋毕竟要考虑地方的承受能力以及一定的公平性。所以,在府一级的较大区域,贡额数会大致参考人口和田地数进行比例性分配,只需在品种方面顾及产地原则,如表3中各府所贡药材基本不同。而由府来分派贡额时,没有这么大的调配余地,就更多考虑药材出产。严州府的淳安、桐庐、遂安三县传统是药材重要产地,故主要承担了该府的药材贡额。这样看似分派不匀,但实际上由于县级行政所承担的贡赋种类甚多,可以将不同种类的贡品互均以达到平衡。有的史料反映了这类制度,《丝绢全书》载:“淮安府药材止征山阳,而睢、赣等县则无;金华府麻地租钱独征武艺,丝、钞二色独征汤溪,而余县俱无。税则轻重虽异,科法彼此互均。”^②

这说明在基层行政单位,不能单纯以某一类贡品的贡额来判断负担轻重及公平性。

① [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31页。

② [明]程任卿:《丝绢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三) 药材土贡带来的民众负担

药材土贡与其他实物贡赋一样,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明代张维斗有著名的《黄连谣》说:“幸者偶然获一二,否则终日挈空器。……监司一纸催,县官神色动,命下如风雷,隶卒打门阁,银铛摔颈到公庭,虎吏两旁莫敢控。”^①即描述了药材土贡带来的民间困扰。因为道地药材主要是野生,产量受自然条件影响。民众完贡时有困难。明穆宗时,大臣傅应祯曾指出:“如户部之秋粮夏麦,礼部之药味药材……顾乃官司费力于刑并,民姓任意以延挨,带征之令虽严,积逋之数如故。”^②

相对于产量,药材土贡更沉重的负担还来自解运花费。梁方仲先生研究明代赋税史有一个著名论断:田赋输纳方式与道路远近有关系,例如远地可以折银,或者影响增大存留的比例^③。然而这一规律对药材并不适用。因为各地所贡药材基本不同,即使数量不多,也要实物起运到京。成化年间广西道御史李榕指出,有的县只是解送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也要上京,“闯关道路,凡四阅月,其费将十倍”^④。路费畸高的情况在折银改革后有直观体现,详见后文。为此不少官员呼吁对运输方式进行改革,如弘治十七年(1504),大臣张升建议:“内府香料并太医院药材,惟苏、松、四川、辽东总解,其余皆陆起解,为害多端,请自明年为始,各该地方将额办香料等物,征完在官,差人总解。”^⑤类解、总解,即以府或布政司为单位一起解运上京,这样可以减轻县级的负担。

二、明中后期的药材土贡改革

明代经济活动逐渐白银化,促进了商品的市场化流通。在这种背景下,许多贡赋实行了折银改革。但在药材土贡方面,改革受到了较多的限制。

(一) 药材土贡折银的赋役改革

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条鞭法”赋税改革,主要方式是合并编派、合并征解、用银缴纳和官收官解等^⑥。本文主要针对药材的改革,同样以浙江为例考察其在地方上的实施情况。

弘治十年(1497),浙江巡按御史吴一贯会同浙江布政司,将上级下达的各类应办物料分为额办、买办、坐办(合称三办)等,折银计算,均派于全省见年里甲丁田之上。也就是将各类额办物资折银,此即所谓“里甲之征”,或称“里甲役”。药材属于“额办”,开始折银上交。如嘉靖《太平县志》有“弘治以来额办派办物料”条,列出药材6种,“价银二两六钱三分二厘”^⑦。对于三办各类物料,官府会指派“收头”来负责。时人记载:“派征丁田必立收头,往年将额办银内分出桐油、胖袄、麝皮、药材、弓箭弦条……每件立一收头,每年不下数人,纳户赏银到官……”^⑧

嘉靖四十五年(1566),浙江巡按庞尚鹏在全省推行均平法改革,将额办、坐办、杂办的所有类别都统一征银,均平科派,折田为丁,确定每丁、每户纳银若干数。加上同期实施的针对徭役的“均徭法”,合起来就是后来全国实行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实现了赋税的简明化和货币化。其中与药材有关的税

① 四川省荣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荣经县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

②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1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74页。

③ 梁方仲:《田赋输纳的方式与道路远近的关系》,载《梁方仲经济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9-56页。

④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第375页。

⑤ [明]林尧俞、俞汝楫:《礼部志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53页。

⑥ 梁方仲:《一条鞭法》,载《明代赋役制度》,中华书局,2008年,第10-62页。

⑦ 嘉靖《太平县志》卷三第15页,《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⑧ [明]张选:《忠谏静思张公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3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419页。

项,就分成了两种,即药材贡数折合的药价银(或称药材料价)与解运费用折算的津贴路费(或称“贴役银”“车脚”“水脚银”等)。天启《衢州府志》记载,南北药材价为九十一两六钱伍分,而津贴路费为四十四两七钱六分^①,药材的津贴路费接近药材料价的一半,直观地反映出运输成本之高昂。

(二)药材土贡改革的上层阻力与基层实施

关于药材土贡的改革,明政府一直都有讨论。太医院基于应用道地药材的需求,原则上是反对改革的。早在嘉靖六年(1527),由于四川、湖广采木任务繁重,采木侍郎黄里建议“药物、皮币、弓矢之类……自六年为始,乞尽免之,以准夫直”,其意是减免药材等土贡以平衡地方负担。但太医院的主管部门礼部提出反对意见说:“药材不可缺,物产各有宜,存留改派之议不便。”“药材不可缺”的观点得到嘉靖帝的支持,“上乃断自四年以前及五年以后,凡药材蠲免、存留、徵解,皆如部议”^②。

天启六年(1626),四川巡按吴尚默上奏建议多种上供物料俱请改贡折银,结果受到训斥:“得旨……药材、蜡、茶等,俱上供急需,宜征解本色供用。吴尚默何得轻议改折,姑不究”^③。“本色”指要实物缴交。可见即使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已经在各地实施,但朝廷始终要求药材等方土物料须进贡实物。所以在表1中,我们看到万历时期太医院接收药材土贡仍然是以重量为单位计算的。

在天启《衢州府志》中,虽然对药材土贡进行了折银,但后面又注明“以上俱本色”^④。折银是对民众而言的,“本色”则指上贡依然需交实物药材。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实物采购环节。以宁波府为例,嘉靖《宁波府志》载:“(药价银)共银五十四两七钱四分,分派五县,解司贮库,委官带领该府识药医生二名,照依估定时价给发买解,不许另金解户。”^⑤也就是说,宁波府是将药材银份额分派于下属5县完缴,然后由府里派专业人员采购和解送。这样至少不需要各县分别派人赴京完贡,由府里集中解运,节约了解运的人力与费用。

后来,一些府还发明了联合解运的做法。天启《衢州府志》卷8记载,该府与金华、严州二府合作,轮流解送药材:“西安等五县,征完解府,轮县金吏采买解司。以金、衢、严三府为一运并解。如:今年金华搭解衢、严二府,明年衢州搭解金、严二府,后年严州搭解金、衢二府。其包裹红黄纸价,三府共该银九两七钱八分八厘陆毫,俱于各该贴解银内搭解,赴部交纳。”^⑥

(三)基层改革的减负作用

药材土贡改革带来最令人瞩目的减负效果,在于运输成本的下降。民众在解运药材方面的负担发生变化,通过折银得到直观体现。

天启《衢州府志》记载药材津贴路费的标准是“每正银一两:北京五钱,南京二钱”^⑦;浙江全省药材银合计为827两,路费银为336两^⑧,大致上,路费约相当于药费的40%。看起来占比不小,但与原先相比已大大降低。

以往解户自行承担解送药材入京的花费,具体数目是没有记录的。但笔者发现,在浙江均平改革时,药材折价银曾经出现过大幅调整的情况,反映了以往花费的情况。如万历《湖州府志》记载,嘉靖时该府药材银原定额为一百六十二两六钱三分,“嘉靖四十三年奉有明文止征银九十六两三钱”^⑨。方志中

① 天启《衢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0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772-773页。

② 《明世宗实录》卷78嘉靖六年七月癸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747-1748页。

③ 《明熹宗实录》卷73天启六年闰六月丙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548页。

④ 天启《衢州府志》,第773页。

⑤ 嘉靖《宁波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辑第1编第78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80页。

⑥ 天启《衢州府志》,第772页。

⑦ 天启《衢州府志》,第772-773页。

⑧ [清]李率泰:《浙江赋役全书》卷一第27页a,顺治十四年(1657)刊本。

⑨ 万历《湖州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1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229页。

没有说明如此大幅度减征的原因。据笔者分析,主要源于路费银的减少。我们来看“均平法”实施时是如何确定折价的。万历《会稽县志》“均平考”记载:“每年预计合属州县里甲,未出役三个月之前,定委廉干官员,不拘本衙门及府佐别,州县正官亲行拘集该年里甲人户与实征丁粮手册黄册,逐户吊审明实,通计合用本年额、坐、杂三办一应银数,共该若干,除官员、举监生员吏、承军匠灶等项照例优免,并外绝人户免编外,其余均平科派,折田为丁,每丁该银若干,某户该银若干,一岁应纳之数,尽在其内。完日,将审派人户花名银两细数,给示晓谕,以便输纳,及造册缴道,以备查考。”^①

可见,“三办”各项价银是以州县为单位,根据以前的情况核算出来。药材土贡原来由各个州县或里甲直接承担,最初均平银可能是按各承担者报告的数量进行汇总,总数自然很高。万历《杭州府志》有所记载(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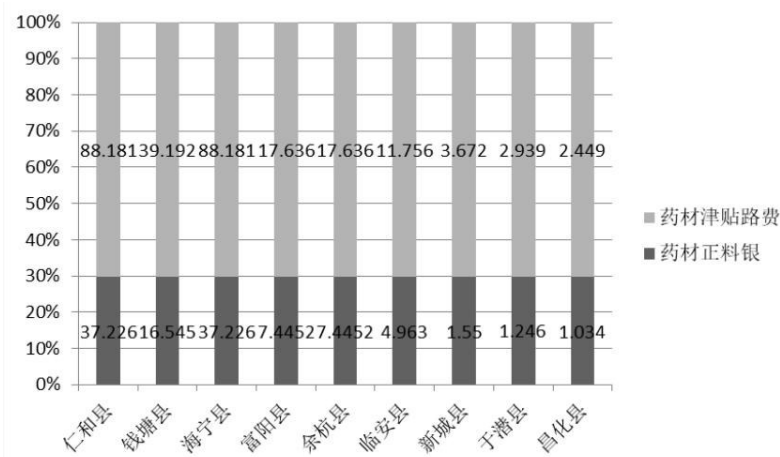


图2 万历时期杭州府各县药材银与路费比例图

资料来源:万历《杭州府志》卷31《征役》。

图2中,药材津贴路费与正料银比率竟然达到7:3。为了核实这一数据,笔者进一步查阅同期各县县志,却发现一些完全不同的记载。例如万历《杭州府志》载余杭县的药材银为“正料七两四钱四分五厘二毫,外津贴盘缠银一十七两六钱三分六厘”^②,但在万历《余杭县志》中,该县药材正料银为一十两三钱二分六厘,津贴路费银为三两七钱六分七厘六毫二丝五忽^③,除了具体数目不同外,最明显的是比例倒置,路费与正银的比例大致是2.4:7.6。其他各县均存在这种情况。这说明,药材路费曾经存在大幅减征的情况。

万历《括苍汇纪》中还有一条关于处州府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南京药材……正价银二两六钱三分七厘二毫,原车脚二十两,今减征十五两。北京……正价三十二两七钱四分,原车脚七十两,今减征五十两。俱知府熊子臣申减”^④。

这条材料明确说明减征的部分来自路费(即“车脚”)。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药材折银后,由各县分运改为由府总运,所以路费有了较大幅度的降低。药材土贡运送方式仅在府级有所变动,就带来这样明显的效果,假如能够做到全省统送,甚至省里解银上交,则更能节约运输成本。之所以没有更进一步改革,恐怕是因为药材市场化尚不成熟。

① 万历《会稽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5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250-253页。

②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一,第17页a,中华书局,2005年影印本。

③ 万历《余杭县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10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275页。

④ 万历《括苍汇纪》,第585-586页。

三、从药材贡赋改革看市场网络发展

太医院职责所在,供奉皇室必须保持道地药材的供应。如果市场允许,他们对药材土贡折银不会从中作梗。例如在清前期,各地取消药材实物进贡,内务府应用药材均委托同仁堂采购,并未引起争议。由此可见,市场供应是否充分是改革的前提。明中后期的改革办法与实施情况,反映出药材市场网络正在初步发育但尚未完善的状况。

(一)药材折银采办范围所反映的市场流通情况

在药材土贡折银之前,其实就存在从市场采购药材完贡的情况。理论上,各地所贡药材应该都是“郡邑所产”。实际上在药材贡额下达的过程中,未必符合产地情况。所贡药材的品种,也许从太医院下发到各行省这一级时经过专门审核,但从省到府,从府到县的分派,是否符合产地情况,就不一定了。以严州府为例,该府承贡品种中有菰蓂,但万历《严州府志》“物产”部“药之材”中并无该药^①,甚至整个嘉靖《浙江通志》卷70“杂志”的“物产”部中,都不曾载有此药。再以浙江太平县为例,嘉靖《太平县志》记载该县弘治以来所贡药材包括:白术二十五斤,台芎五十斤,猪牙皂角一斤,粟壳一十二斤,半夏曲一斤,生地黄二十斤。以上见于同书“物产”部的只有芎藭(即台芎)和半夏^②,其余均无。

药材品种繁多,基层官员未必均能熟悉,能将任务分派下去就可能出现以上情况。遇到这类情况,地方上唯有折银采办。正德《姑苏志》药味类土贡清单后明确地说:“今之贡,虽责其土之所产,亦有购之所在以充者。固岁有常品,而交纳之费及数倍其价云。”^③这种采购意味着区域性药材市场的存在。

有的地方即使产药,但如达不到上贡标准,也只能通过采购来完贡。如万历《龙游县志》载:“间产药材,不闻佳品。即岁办枳实、枳壳数种,亦征银市于会城。”^④会城亦即省城。这说明至少在省会等较大城市中,药材的流通与供应有一定的保证。包括部分药材甚至可到京师采购,因此有的地方曾出现私下折银的情况。明代中期刘大夏指出:“太医院额办药材,多有本地不产,买办于京者。”^⑤

在这样的条件下,太医院也有所变通,其在嘉靖十三年(1534)表达了对药材贡赋折银的有限度同意:“议准岁办药材以十分为率,九分采办本色,虽遇灾伤不许折价;其一分折银,解送以备收买应用。”^⑥

当然,只同意一分折银,意味着京师附近的药材市场化供应仍然是不充分的。而且当时市场上药材价格偏高。时人记载:“大抵浙民最苦重役,役难尽蠲,均则不扰。漕粟重大,姑置勿论,他价高而缘为利者,如药材、颜料类;价少而民害者,如绢折类。利则饱奸,害归良善。”^⑦药材属于“价高而缘为利”的种类,于太医院而言自然不愿意“饱奸”。张维斗在《黄连谣》中说:“连价何以给?官价仅六分,民价倍几十。”^⑧说明官府收买价未必遵从市场,但这是指在产地对农民带有掠夺性质的折银收购,而在城市销地则不可能过分偏离市场价格。高寿仙的研究指出^⑨,明代京城买办物资,虽有会估议价,但总体上注意“依时价两平收买”^⑩。

① 万历《严州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75页。

② 嘉靖《太平县志》,卷三第15页a。

③ 正德《姑苏志》,《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26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3页。

④ 万历《龙游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0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61页。

⑤ [明]刘大夏:《刘大夏集》,岳麓书社,2009年,第43页。

⑥ [明]申时行:《明会典》,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421页。

⑦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第467页。

⑧ 四川省荣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荣经县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

⑨ 高寿仙:《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⑩ [明]申时行:《明会典》,第4322页。

在品种和市场方面,当时税收资料的记录方式也能反映明中期以前京城药材流通的规模不大。万历《明会典》卷35记载了景泰初年制定的顺天府《收税则例》,提到“药材每斤……二百文”,只有大类而没有具体品种,但在同一文件中,对食物和日常用料如荔枝、圆眼、冬笋、松子、桐油、柏油、黑砂糖、蜂蜜、香油、紫草、红曲、紫粉、黄丹、红枣、杨梅、枇杷、榛子、杏仁、蜜香橙、乌梅、五倍子、生姜等却一一列明^①。据此或可推测其药材贸易规模很小,故未细列。太医院所需求的道地药材,难以保证可在市场购得。

(二) 贡赋改革与药材市场的互动影响

明代药材土贡的改革虽然是局部性的,但有理由相信它对区域性药材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每年集一府之折银采办药材,相当于为药材市场注入了较为大额的资金,有利于刺激各区域药材市场的活力。药材品种更多地进入商业流通网络,促使一些地区发育出全国性药材市场。反过来,这又使药材贡赋最终实现货币化改革。

明末的资料中,已经可以看到市场药材供应的增多。如杭州北新关是明代运河七关之一,初建于明宣德年间。现存一份较为完整的明末《北新关商税则例》^②,列出了“药材”类商税标准。所开列药物有人参、竺黄、石蟹、熊胆、紫河车、牛黄、黄连、石燕、鹿茸、没石子、羚羊角、龟胶、阿胶等214种^③,另外还有“草药”“杂药”“丸药”“膏药”等类也涉及药材。该药物清单有两个特点:一是流通品种基本覆盖了大部分临床常用药,如果加上“香椒白蜡干果类”中的乳香、没药、檀香、速香、木香、硼砂、丁香、川胡椒、降香、茴香、枣子等,就更齐全了;二是这些药材来自全国各地,并非一地所产。当然细究之下,该清单中仍然有欠缺,例如缺少党参、麻黄、桂枝、茵陈蒿等常用药,同时也没有枳实、枳壳、乌药等浙江本土药材贡品。但总体上已算丰富。

经过北新关的药材既可能进入杭州,也可能沿运河北上进入北方省份。与之相应的是,明末也有一份关于京师一带药材流通情况的史料,即崇祯十五年(1642)兵部郎中龚彝请求购买药料的文书《兵部行〈市办药料呈赴督师军前〉稿》,其中提到在北京采购人言(信石)、大附子、大黄、樟冰、辰砂、干漆、巴豆、狼毒、铁脚莲、天雄、花椒等50多种药材的价格情况^④。虽然已有学者论证这些药材并非用于医疗,而是用来制造毒药武器^⑤,但以此推测,明末京师市场上流通的药材种类也已比较齐备。

这种情况,成为清初实现太医院的药材采购制度变革的基础。清朝开国不久,顺治九年(1652)下诏:“各直省应解本色颜料、药材等项,除京师无从备办者仍解本色外,余俱应折银。”^⑥这里无法备办的药材有多少不得而知。但最迟到康熙时期,药材实物进贡的制度已经基本废弃了。在清宫档案中,关于药材进贡的资料极少,据知仅存一册黄册,“为顺治间,收过各省解到药材钱粮及支用过数目等项,由礼部造报”^⑦,此后再系统性进贡药材的记录。康熙三年(1664)虽有“其直省岁解药材本色并折色钱粮均由户部收贮附库”^⑧之诏,但在康熙《杭州府志》中可以看到,在“礼部本色”项下虽然列出应贡药材品种数

① [明]申时行:《明会典》,第1020-1021页。

② 此本原为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明代稿本。从内容看,与邓之诚所见《江湖必用买卖机关赋》二卷附录的《北新关商税则例》相近,邓氏指出:“商税中有纱帽男裙等物,或为明季所刊。”见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上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③ 《北新关商税则例》,载孙忠煊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33-370页。

④ 龚彝:《兵部行〈市办药料呈赴督师军前〉稿》,《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89-390页。

⑤ 陈清莲、胡安徽:《〈兵部行市办药料呈赴督师军前稿〉辑注》,《中国科技史杂志》2013年第3期。

⑥ 《清实录·世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499页。

⑦ 单士魁:《清代档案丛谈》,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⑧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4页。

量,后面却注明“药材改折银”^①,表明这时药材土贡基本都已折银上交^②。清宫太医院用药的制度为:“内药房所需药材均按定例给价,令药商采办。”^③

四、余论:药材市场化对医疗用药的影响

在学术上,中医一直重视强调要使用道地药材,唐代官修药典《新修本草》说:“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④到了明代,“方书常常是要求‘上件俱要道地’‘具择道地精新者’”^⑤,但结合本文所述,古代的药材市场网络发展在很长时间里是支持不了这种需求的。对医书的背景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明代较多提出“道地”要求的,主要见于《普济方》《奇效良方》和《古今医统大全》等著作,而它们恰恰都具有宫廷医疗背景。《普济方》是朱元璋第五子朱橚带领王府医者编修的,《奇效良方》的两位作者董宿、方贤均曾担任太医院院判,《古今医统大全》作者徐春甫也是太医院御医。显然,在前市场化时期,只有太医院能够通过贡赋体系汇集全国药材,因而他们的知识体系也一直强调必须应用“道地药材”,以致成为明中后期药材贡赋折银改革的阻力。

与太医院的专业角色不同的是,地方官员面临着纾解民困的压力,因而努力推动地方层面的变革,促使局部区域内药材土贡的逐步货币化,推动了药材的市场流通。

药材市场流通的进一步扩大,又依赖于“道地药材”观念的扩散。因为只靠皇家采购不足以支撑和壮大药材市场。而明中后期江南城市商业的繁盛,加上太医院作为知识权威的引导,使得应用道地药材逐渐成为民间时尚。《万历野获编》提到京师市面上药店招牌多有书“地道药材”者^⑥,明代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因经营各地药材而成巨富,反映了这一状况。明后期至清代各地涌现出许多大药号,无不标榜自己应用道地药材。最有名的是康熙八年(1669)在北京开设的同仁堂乐家老铺,创办者乐凤梧称其父太医院吏目乐尊育“喜阅方书,辨药味地道疑似”,因此开办药号后其宗旨为“尊《肘后》,辨地产”^⑦,“购料不惜重资”^⑧,把道地药材作为重要卖点。后来同仁堂发展成为主要供应中上阶层的高端品牌。

本文借助明代药材贡赋改革的资料,透视当时的药材市场化情况。由于道地药材的产地依赖性很强,如果没有发达的供应网络和充分的市场流通,难以保证医疗用药。因此药材贡赋改革的进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药材市场流通的情况。史料反映出明中后期的药材贡赋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药材市场流通规模的扩大,为清前期全国性药材市场的充分发展以及宫廷药政制度的变革打下基础。道地药材的市场化供应保障了医疗需求,也对明清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李良木,胡文亮)

① 康熙《杭州府志》,《浙江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② 由于这部分折银来自原来的“本色”(即实物),所以后来方志中又出现“药材本色银”这一名目。

③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第154页。

④ 尚志钧:《新修本草(辑复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⑤ 黄璐琦、张瑞贤主编:《道地药材理论与文献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18-19页。

⑥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15页。

⑦ 《同仁堂药目》,乐凤鸣序第1页a,北京同仁堂,光绪乙丑(1889)年重刊本。

⑧ 《同仁堂药目》,本堂序第1页b。